

赛博马克思： 虚拟空间中的社会运动与资本逻辑

摘要：赛博空间正在重塑虚拟与真实的关系，虚拟与现实的边界模糊，重构了人们理解与应对实在世界的方式。赛博空间的兴起是资本主义经济驱动的结果，这一场域消弭了时空限制，加快了资本流通速度，从而助长了资本对社会行动主体的控制。与之相伴而生的是，赛博空间正在塑造新的阶层，虚拟身份的建构与现实壁垒的打破使得社会斗争以新的形式展开。资本奴役与文化占领都在以商品化的方式展开，马克思主义对于商品逻辑的剖析能够应对赛博空间的新动态。

关键词：赛博马克思；符号学；赛博空间；商品；资本

DOI:10.15997/j.cnki.qnjz.2022.02.046

马克思主义直面赛博空间是其理论发展的必然。从时间上来讲，马克思主义在特定时代要处理对应的问题，正如美国马克思主义者麦克·布洛维所言：“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马克思，通过阐发这一传统，来解决当时的问题。”^[1]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必须直面赛博空间这一新的场域，解决其中涉及的各种复杂问题。从空间上来讲，赛博空间实现了全球互联，马克思主义所要实现的全世界人民联合有了新的可能，国别政治受限的文化与经济壁垒在赛博空间中被打开口，不同主体之间的身份建构与社会联系生成了新的形态。这些新问题与新状况都需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深入，同时，也正是通过对赛博空间的观照，马克思主义才能在全球化语境中继续发挥它的理论价值，实现它的理论诉求。

赛博空间中的虚拟与现实

当我们处理赛博空间这一问题时，首先需要厘清的就是虚拟与现实的边界问题，可是一旦进行边界划分就容易陷入“二元论”的泥沼中无法抽身，虚拟与现实的互渗成为常态，这也使得我们无法区分绝对的真实真实与虚拟幻象。因此，在虚拟与现实的中间地带，是更为宽阔的虚拟现实空间，既立足现实又有虚拟成分。这个场域涉及大量的符号，用以替代不在场的对象。

有关虚拟现实的界定，很容易陷入技术论的圈子里。如有学者认为，“虚拟现实是一个技术领域，人们能利用它仿造出或创造出虚拟环境（或虚拟世界），并让人们能身历其境地进入（或浸入）这一环境（或世界）”^[2]。再者，由于概念复杂，进入属性分析的概括也成为一种界定方法，如归结虚拟现实的属性有仿真性、交互性、想象性^[3]

等。这些界定不足以说清楚两者边界问题，或者说，简化了虚拟现实问题的社会性。

如果虚拟现实只是一个技术问题，那完全可以从技术的源头去分清虚拟与现实的边界。可事实上，虚拟现实本质上是一个符号再现的问题。“再现就可以被理解为携带意义的呈现。”^[4]所以，虚拟现实其实是接收者将“对象本体”与“呈现对象的符号”进行了等同，这就卷入了所谓的逼真感、仿真技术等一系列问题，但问题的解释最后还是要落脚到接收者的阐释意义上来。当所有阐释者主动搁置真实与虚构的技术框架，就会将真实与现实相混淆。

当我们在恐惧虚拟渗入现实，甚至扭曲现实时，可能担心的对象本身就出了问题。真正恐怖的是，真实不再重要，我们整个世界都是虚拟的，虚拟才是意义世界的真相。在赛博空间当中，所有人的身份都是虚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制造了一个替身，“赛博空间将自我从对自然身体的依附中解放出来，转变为一种漂浮于偶然、临时替身之间的虚拟实体”^[5]。这样的状况将重新构建新型的社会关系，每个人获取意义的前提就是承认虚构的真实性，因为虚构出来的对象本身也意味着一种真实。新的革命斗争也将转移到赛博空间中，现实的诉求无法实现，人们转而将在赛博空间中重新制定规则并展开行动，这就是新的对资本主义制度革命的出路。

相反的观点认为，赛博空间为资本主义提供了新的生存发展空间，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在赛博空间中被转化和消散。现实的斗争被消磨为虚拟实体之间的唇枪舌剑，游行的广场变成了网络上的全民狂欢，后现代社会的解构浪潮在赛博空间蔓延，对象离场，符号成为主宰，

这就形成了新型的符号霸权。

在新型的符号霸权下，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单纯地刺激符号消费，而是让主体不断地向符号投射欲望，正如虚拟现实创造的游戏世界让玩家深度沉浸，一旦所有行动主体都沉浸于虚拟空间，虚拟实体将比真实实体更加“真实”。因为在赛博空间中，每个人都释放了内在的欲望，满足了自身的意义需求。这种需求可以是有关商品消费的，可以是有关感官体验的，甚至可以是模拟人生的。

人生的意义需要真实的个体亲自实践，而当符号可以替代主体进行一切社会行动，维系所有社会关系时，符号就获取了新的权力结构。在赛博空间当中，人与人之间的意义交流不再是面对面的，中间始终隔着一块屏幕，这个屏幕连接的是处于不同时空的个体，表意的时空距离消失了。每一个智能终端将同时知道世界任意一个角落发生的事件，共同体的幻象在那一刻显得尤为真实。

我们制造的符号反过来成为我们的寄托，我们离不开赛博空间中那个虚拟实体的承载，我们所有的表意方式也被符号所重塑，我们的思维方式与思考能力更容易被资本所控制，这似乎又走到了资本主义制度革命的反面。“从历史规律来看，符号表意性，随着文明的进程而增加。当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符号泛滥’。”^[6]按照这个历史趋势继续走下去，符号的表意能力强大到能够完全取代对象，甚至于取代主体。

虚拟与现实边界的模糊肇始于符号表意能力的升级。当虚拟能够替代真实，或者说，虚拟就是真实时，马克思主义所要处理的问题也需要对应地发生变化，但唯一不变的将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在赛博空间中，施展控制与压迫的权力更无处可寻，赛博空间也被吸纳到资本的链条当中，投身其中的主体在其中消耗时间，进行非物质生产，个人投注到真实世界中的时间远低于虚拟世界，这意味着社会行动主体被引导到新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没有直接的暴力冲突与压迫，没有人人与人之间的肢体接触，唯有代码生成的文字、图像与视频。

马克思主义没有预见到未来的社会空间会朝着虚拟化方向发展，在19世纪的革命浪潮中，阶级斗争最终都是要转化为具体实践的，面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迫与剥削，共产党人的目的是“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7]，而一旦真实和虚拟的边界互渗，乃至于虚拟占据主导，那现实的革命活动就需要重新转移阵地，暴力的形式也必然发生改变。甚至于，我们需要重新反思马克思主义在赛博空间中所要处理的对象，以及寻找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赛博空间中的社会运动

赛博空间是“由计算机网络中的电子数据流构成的

概念维度”^[8]，智能终端经由网络形成了彼此的关联，从而形成了我们所谓的赛博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每一个活跃的ID都可以指向现实中的某一实在主体，即使是伪造的身份最终也能指向一个创造身份的实在主体，因此，赛博空间中活跃的虚拟主体最终都可以追溯到一个实在主体，这就是赛博空间与现实世界的关联。在赛博空间中，所有的信息经由计算机与网络得以传播，其中有关权利的伸张、罢工的反抗、自由民族的呐喊都是经由符号传播，而非现实中的广场呐喊，亦非游行示威或暴力对抗。因此，赛博空间的社会运动有可能被视为一种虚拟抗争，与实在的抗争相区别。

从传播角度来看，不论是赛博空间中的虚拟抗争，还是现实社会中的肢体对抗，都是经由不同媒介传递意义。民众通过网络表达自己在政治或经济上的诉求，其目的是想要实现与当权者的对话。抗争的主体始终是实在的，只是这个主体出场的形式有虚拟或实在的区别。因此，赛博空间中的斗争与实在世界的斗争在意义上是相通的。

我们不应从手段，而应该从效果来审视赛博空间中的社会运动。《共产党宣言》强调“共产党人到处都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9]，而要将全世界民主政党团结起来光靠报纸是不够的，赛博空间重塑了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方式，进而重塑了反抗的形式与斗争的路径，这是技术更新背景下历史发展的结果。如果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0]，那么，赛博空间的出现，将一切国家的意义交换变成世界性的了。商品的生产与消费还是纯经济领域的活动，意义的共享则穿透了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边界。在这个共享的赛博空间中，职业、性别、种族、国籍、年龄等现实状况仍旧存在，但共享意味着，赛博空间可以重新构建意义规则，入场的门槛不再单纯是经济实力或社会地位，而是端口的接入，虚拟主体在这个空间中获得了比社会空间更低的存在成本。当然，赛博空间中仍旧有歧视与不平等，但反抗的成本也远低于现实的直接对垒，从经济原则上来讲，赛博空间降低了反抗可能造成的现实损伤和经济成本，这意味着，反抗的可能在这个空间被不断激活，甚至呈现上升趋势。

恩格斯笔下1886年的美国工人运动是这样的：“5月，掀起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芝加哥和密尔沃基等地发生了骚乱，统治阶级试图用暴力和残酷的阶级审判来镇压工人方兴未艾的反抗高潮。”^[11]当时的工人运动直接诉诸现实斗争，反抗本身也必须直面统治阶级的暴力镇压。伴随着抗争浪潮的结束，资本主义制度也进行了自我调整，一方面强化了控制局势的能力，另一方面则

削弱了民众反抗的可能性。

而到了1990年,在硅谷的“看门人正义”(Justice for Janitors)^[12]运动中,罢工者“发现了甲骨文公司员工的电子邮箱地址,发布了有关剥削劳务人员的信息,并鼓励他们的读者向管理层提出抗议。他们还通过互联网传播罢工的消息,提供邮箱地址,请求网民向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投诉”^[13]。斗争的形式利用了网络,赛博空间对现实世界施加了压力,民众的政治经济诉求经由赛博空间中介,最终在现实中达成。赛博空间已然成为不可忽视的斗争场域,而这一场域是马克思主义没有预见与评估的。

卢卡奇在谈及物化时认为,由于生产过程和社会生活被理性原则组织起来,现实个体的主动性丧失,沦为被动的客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取代,因此,每个人都成为孤立的客体。机械化的局部劳动将劳动者放置到异己的系统中,“生产的机械化也把他们变成一些孤立的原子,他们不再直接—有机地通过他们的劳动成果属于一个整体,相反,他们的联系越来越仅仅由他们所结合进去的机械过程的抽象规律来中介”^[14]。这种原子化的个体处境在赛博空间中也改变,因为赛博空间重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机械化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所分离,而赛博空间重建了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换言之,赛博空间填补了现实生活中的孤独与无力,在这个场域中,职业、性别、种族、国籍的差异并不能阻碍彼此之间的交流与争论,劳动主体在现实劳作之外找到了自己与世界联系的另外一种方式。“赛博空间是一个潜在的重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信息资本可以抵制社会化分工造成的原子化。”^[15]每一个参与赛博空间的主体都在这个空间中进行信息生产与传播,这同样是一种劳动形式,也正是通过这一形式,劳动主体有可能摆脱自己的原子化处境,借由不同的网络社群、论坛、兴趣圈子等找到归宿。

网络身份作为身份的一种,同样凝合在自我构成中,身份在不同空间中进行了差异化的展演,但本质上它们还是主体意识的彰显。赛博空间中的社会运动不仅存在,且具备着与现实世界相似的意义和价值。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反抗的当代,赛博空间将成为重要的斗争场域,也正是通过对这一场域的分析,让民众有机会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与当前虚拟现实联系在一起,从中开掘抗争剥削与压迫的新形式与新可能。

为经济驱动的赛博空间

赛博空间可以为反抗资本主义制度提供新的斗争场域,但反观赛博空间的形成与发展,它的最初源头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肇始于军事工

业的支持,通信技术最开始也局限于政府内部。计算机网络从军事转为民用,背后是经济的推动。因此,回顾赛博空间的发展源头,我们可以发现,赛博空间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组成部分。

尼克·戴尔—威则夫特在《赛博马克思》(*Cyber-Marx: Cycles and Circuits of Struggle in High-Technology Capitalism*)一书中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类比,他回顾历史,“在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起义之后,拿破仑三世下令冯·奥斯曼男爵重新设计城市,这个城市重建的核心是扩大街道,允许通过炮兵来镇压任何未来的反叛。鲜为人知的是,发展这个高速公路项目的工人,是住在巴黎肮脏贫民窟里贫穷的泥瓦匠和建筑工人,他们是未来革命爆发的主要参与者——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占领了城市,使稳定的欧洲资本主义受到震荡”^[16]。这段历史在暗示,如今资本主义兴建的信息高速公路与拿破仑三世修建的城市公路有相似性,网络技术及其平台的发展,不仅为资本的流通创造更便捷的手段,同时也为形成反对力量提供了准备条件。

这一现状的形成并不完全受到资产阶级的主观意愿控制,它是资本驱动机制下的客观历史积累。赛博空间加速了资本流动的速度,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的增殖。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17]。资本需要加速流通的本质驱动了赛博空间的扩张,这也使得赛博空间同样逃不开经济发展的规律。

大卫·哈维对于资本的无限度运动有着更为丰富的分析,虚拟资本就是资本在赛博空间中的流通,“如今越来越多资本以虚拟形式流通,而电子货币原则上是可以无限创造出来的(它们只是屏幕上的数字)。因此,这个领域的无限增长并无障碍”^[18]。虚拟资本在赛博空间中获得更大的自由,虚拟资本所创造出来的价值可以与现实世界中的真实价值创造脱节,不受控制的资本积累将加剧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并最终酿成危机。

在赛博空间中,身处其间的主体同样在进行着劳动,托夫勒称之为“生产消费者”(prosumer),活动于赛博空间的主体在不断生产信息,这些信息则被资本所利用,在与信息相关的产业中,“资本获利并不是靠在生产上投资,而是靠占有使用信息、软件和它建造的网络所产生的租金和特许权”^[19]。从非物质劳动的观点来看,身处其间的主体不仅具备获取新型抗争手段的可能,也有被继续利用的可能。赛博空间并不是纯然地为抵抗资本主义制度服务,客观现实是,赛博空间成为利益博弈的场域,抗争与压迫同时存在。

赛博空间的成熟是资本驱动的结果。马克思在他所处的时代就预见资本主义对于商品流通扩大的需要,

世界市场的形成导源于资本主义寻求消费主体、扩大交易市场、获取利润的经济诉求，资本越过了地域的阻隔，打通了国家之间的壁垒。如今，赛博空间进一步冲击着国家之间的界限，为资本的快速积累寻求新的增长点。现实中的轮船、飞机加速了商品的流通与交换，虚拟世界里的资本流动与之相匹配，两者的互连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动态，但回想尼克·戴尔—威则夫特的类比，赛博空间在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同时，可能也埋藏着摧毁这一制度的因子。

《共产党宣言》直言，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20]，换言之，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力的进一步发挥，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也在动摇，新的生产力孕育着新的阶层，赛博空间推动着新的世界秩序形成，在这个秩序中，每个人都被重新纳入新的生产位置中，对于剥削的不满与对自由的向往，将激发网络中更激烈的反抗。赛博空间催生了新的无产阶级，共享机制也有可能实现信息的无产阶级化，这种种的一切昭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向度。

结 语

赛博马克思具有多重意义向度。就研究对象来看，赛博空间正在重构现实与虚拟的关系，社会行动主体在赛博空间中获得了自由，也遭受着新型压迫，这一空间仍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要处理的问题域。就研究方法而言，赛博空间内的商品交换，资本流通仍旧遵循着经济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商品、货币、资本的剖析需要进一步更新，由此处理图像商品、虚拟货币、非物质劳动等新问题，方法论的更新正是马克思主义永葆活力的内在机制。就研究前景来看，伴随着虚拟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经济投入，其商用化程度加强，人与商品之间的关系也被重塑，主体与客体的界限也在经受挑战，传统视域中“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取代的论断也在变异。

在赛博空间中，人的符号化建构延伸了主体力量，社会行动者主动将主体虚拟化，以不同虚拟身份维系社群关系，建构自我，获取存在的意义。一切的变动与更新往往都离不开商品经济的桎梏，赛博马克思具有朝向未来的前瞻性，正是通过把握赛博空间中的资本逻辑，可以将一切变动纳入阐释框架中，这也是赛博马克思进行理论构建的内在需求。

伴随着元宇宙概念及相关技术的兴起，赛博空间的形态也将发生改变，即实在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壁垒被技术消弭，主体的实存与虚构得以实时同步。元宇宙为资本的活跃重新开辟了领地，虚拟土地的交易、虚拟艺术的拍卖、虚拟场景的设计等等，都满足了资本膨胀的内需，

而其底层逻辑就是意义世界的总体拓宽，由此打开新的资本通路。元宇宙将投入其中的所有主体与客体都商品化，任何实体的符号化都是经由技术包装的商品，由此，一切皆商品。

从商品分析入手是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必由之路，对经济基础的研究是把握文化动态的必要环节。面对纷繁复杂的商品形态，以及新兴技术的蓬勃发展，它们内在的资本逻辑始终是文化研究所欠缺的维度。赛博马克思试图将文化研究重新拉回经济分析的视域，即纷繁复杂的文化底色是经济运作。在直面新的问题场域时，赛博马克思将一切有关文化的阐释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结合，由此完成对当代社会总体状况的有效阐释。

【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青年课题“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总体状况研究”（编号：22NDQN204YB）、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商品批判理论研究”（编号：Y202146186）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 Burawoy, M. For a Sociological Marxism: The Complementary Convergence of Antonio Gramsci and Karl Polanyi[J]. *Politics & Society*, 2003, 31(2): 193-261.
- [2] 刘锦德, 敬万钧. 关于虚拟现实——核心概念与工作定义[J]. *计算机应用*, 1997(3): 1-4.
- [3] 周思跃, 龚振邦. 虚拟现实定义的探讨[J]. *计算机仿真*, 2006(9): 219-222.
- [4][6] 赵毅衡. 符号学[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36, 33.
- [5] 何李新. 齐泽克的赛博空间批判[J]. *外国文学*, 2014(3): 135-142.
- [7][9][10][20]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65, 65, 31, 40.
- [8][13][15][16] Nick Dyer-Witford. *Cyber-Marx: Cycles and Circuits of Struggle in High-Technology Capitalism*[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Urbana and Chicago, 1999: 122, 126, 127, 129.
- [1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271.
- [12] 注解: Justice for Janitors (JFJ) 是一个社会运动组织, 致力于维护美国和加拿大看门人(看门人和清洁工)的权利。该计划于1990年6月15日开始实施, 以应对看门人的低工资和最低医疗保障。JFJ包括美国至少29个城市和加拿大至少4个城市的22.5万多名看门人。成员们争取更好的工资、更好的条件、更好的医疗保健和全职工作机会。
- [14]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 杜章智, 任立, 燕宏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157.
- [17]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178.
- [18][19] 大卫·哈维. 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M]. 许瑞宋,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16: 268, 262-263.

(作者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后)